

教金庸下了两年多围棋

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,我想起了教金庸下棋的往事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只要金庸人在香港,都会请我去他家里下围棋。“最早应该是1983年初开始的,1985年结束,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楚了。每个周六下午两点,只要查先生(金庸本名查良鏞)在香港,他就派司机在金钟地铁站接我,然后到他的家里上课。”

那年金庸59岁,我只有24岁。我是广东人,自幼学习围棋,1978年获得广东省围棋冠军,1980年移居香港。到香港后,我很快就成为全港冠军,但那时候在香港凭围棋无法

谋生,我只能平时打工,周末去大学里教棋,赚点微薄的学费补贴生活。

我与金庸相识,离不开简怀穗(香港围棋社社长)成立的香港围棋社。简怀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赢得过中国国际象棋冠军,后移居香港,他成立的香港围棋社也成为来港围棋爱好者切磋棋艺的重要场所。1981年,在台湾颇有名气的业余六段棋手沈君山在香港围棋社,与我进行了一场对决,结果被我击败。在一旁观战的棋友,恰恰就有另外一位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,梁羽生随后写了一篇《曾炳辉劫杀沈君山》的文章,发表在《成报》头版,这篇文

章被金庸看到,通过简怀穗的介绍,于是我就成了金庸的座上客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每次开棋之前,金庸都会很客气地说:“曾老师,你不要让我,尽你的水平下。”话虽这么说,但每盘棋我还是会让金庸三个子。每次上课,我都与金庸下一到两盘棋,基本是赢一盘,输一盘。如果第一盘下得很高兴,通常就会将剩下的时间用来复盘。当然,教大师下棋并不容易,尤其“输”掉的棋更难下。“你既要让他走好棋,又不能输得太明显。”

第一次课上完后,我收到一个信封,到家后一数,里面一共是1500元港

币。“吓了我一跳,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,要知道,我当时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才1200块。”

到了1985年,这种上门下棋的课程就结束了,两年多时间,我收获很大。“最大的感触,是第一次知道这么有名有钱的人,对下围棋的人这么尊重。金庸对于中国香港围棋协会最大的支持,还是当年协会刚刚成立极度缺乏资金时,他在尖沙咀黄金位置花100多万港币买了一层楼,以1块钱的年租金租给协会使用,这样的支持力度真是太大了。”(口述/香港 曾炳辉 65岁 中国香港围棋协会会长整理/王子江)

第一次去北京

1988年7月24日,我们一行七人(三名村干部和我们四个年轻人)坐客车去北京,这也是我第一次坐客车,奔赴首都北京。那时候村里为发展村集体经济,打算开办一座加工厂(后来的京深汽车配件厂),来提高村里人的收入,解决富余劳动力的问题,当时我们几人就是特地去学习相关技术的。第一次坐车,我晕车特别厉害,走了将近一半路程,晕车的情况才好了一些。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们便开始学习,学习一个礼拜后,村干部带我们去参观了故宫博物院等地,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张彩色照片(如下图)。学业完成后,村干部还带我们去了电影院看电影,去东风市场游玩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,我们踏上了回家路程,开始为村里的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。(河北深州 张连福 53岁)



张连福在故宫太和殿前的留影

烧六六粉熏杀蚊子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出生在冀南一个农村。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夏日晚上,在土坯屋子里睡觉不但闷热,而且屋里的蚊子在身边飞来飞去,嗡嗡叫着,让人没法入睡。还是父亲有办法,他从村里供销社买来一包六六粉(当时不知道六六粉毒性极大,对人体有害)。晚上入睡前,他抱上一些麦秸放在屋里地上,把门窗关好,再往麦秸上撒一点六六粉点燃。屋里虽然有股六六粉难闻的气味,但这方法能把蚊子给熏杀死。随后开开门窗跑跑熏呛味,全家人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。(河南郑州 李朝云 60岁)

“逃票”看电影

上世纪

60年代初,惊悚片《夜半歌声》在我家附近的浦东塘桥镇小学操场露天放映。或许一毛钱的票价不算贵,但对我家来说,那可是一日的生计支出。我找到最铁的玩伴荣昌和荣欣兄弟俩,决定冒险看场“逃票”电影。

一条大约十米宽的小河绕着学校的操场流过,学校在操场周边筑起一圈竹篱笆。离河面大约两米高,有一根自来水管接通到校园。它,就是我们看“逃票”电影的唯一通道。我们太想看电影了,早已顾不上万一掉进河里的“危险”。不过五六分钟,我们顺利荡过小河,然后潜伏在操场篱笆外的草丛里,观察着巡视纠察的动静。乘纠察走远,我们看准时机,迅速翻越篱笆,跳进操场,然后猫下身子弯着腰,趁着夜幕迅即混入观影人群。电影散场后,我悄悄地溜进屋内。母亲见我,什么也没说。我钻进蚊帐里,躺在竹榻上,回味着电影中的情节,渐入梦乡。(上海 方鸿儒 76岁)

《夜半歌声》电影宣传书签



在《沙家浜》剧组吃忆苦饭

“文革”期间,我在北京京剧团《沙家浜》剧组工作。为了排好“革命样板戏”,中央派军代表进驻剧团。同时,上级给演员们发了不带帽徽领章的军装,参照部队模式,实行军事化管理。当时,根据部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收到很好效果的经验,剧团领导准备组织演员们吃一顿忆苦饭,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。

剧组人员吃忆苦饭,有政治基础。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演员,不少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,在旧社会吃过不少

苦。我小时候在北京,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,靠目不识丁的母亲临时打工挣点钱过日子,吃了上顿没下顿,在生死线上挣扎。有次我见邻家孩子端着的碗中又黄又白的吃食,问母亲她吃的是什么,母亲告诉我那是鸡蛋炒饭,黄的是鸡蛋,白的是饭粒。那时,我从未吃过白米饭,只认得窝窝头和豆腐渣。

吃忆苦饭那天,我原以为食堂要布置一番,至少窗子要拉上窗帘或糊上报纸,制造一种特定的氛围。谁知,吃饭地点不在食堂。只见厨房师傅送饭

来到楼上办公区走廊,一声招呼,谭元寿、马长礼、周和桐等老师带头,我们紧紧跟上,每人分到了一个糠窝头,各自回屋吃了起来。记得,我掰开糠窝头,放一块于口中咀嚼起来,吞咽时被噎住了,觉得特别难吃,但立即想起了一句名言: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

吃忆苦饭后,我们启程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《沙家浜》现代戏影片。尔后,到朝鲜访问演出,圆满完成了任务。(口述/北京 岳惠玲 82岁 整理/周耀明)

放气球赢利四万多元

20多年前,基层气象部门都有一个叫“气球服务中心”的机构,主要工作就是在客户庆典时施放氢气球。我曾当过某气象站的气球中心主任,说是主任,其实只有我一人。

施放气球是个力气活、危险活,全站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“气象业务”充当我的部下,但一个人确实无法完成工作,自然要请其他同事帮忙,这就要格外客气。为了考虑后路,我还要给他们发奖金、请吃饭。有时,一

天的“进账”竟不抵一晚的“消费”。

有一天,工会组织职工活动,除值班的外,能走的都走了。偏偏这一天,一家建材商场开业,急需人施放气球。我立马去找货车拉气缸。在运气缸的路上,我发现几个拉平板车的小伙在等“生意”。何不叫他们帮帮忙呢?

一拍即合。三个年轻人跟着我上了运气缸的货车。到了建材商场门口,还没等我下车,三个小伙子已经开始卸气缸

了。晚上收球时,我按预先讲好的价钱,每人付了十五块钱。天色已晚,我带他们去了一家牛肉面馆。三个小伙子边吃边夸。其实,当时的三碗牛肉面一共才九块钱,而上回请单位那帮人边吃边娱乐,一次就花费一百多元。此后,我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开始。

年底算账,我负责的气球中心净赢利四万多元,我个人也因此获得几千元的奖励。(安徽铜陵 霍寿喜 60岁)